

陈瑞云著



「清帝列传」

宣统皇帝 传

下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K827
45
:2

清 帝 列 传

宣 统 帝

(下)

陈瑞云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宣统帝/陈瑞云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皇帝丛书·清帝列传)

ISBN 7-80528-681-7

I . 宣… II . 陈… III .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 - 传记
IV .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122 号

宣统帝

作 者:陈瑞云

责任编辑:邱莲梅

封面设计:正典书装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310 千字

印 张:16

版 次:199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28-681-7/K·277

定 价:35.80 元(上、下册)



第十章 禹居天津，落入日本侵略者的圈套

溥仪出宫后成了中华民国的一个平民。他面前摆着两条路：

一条，如他自己表示的，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平民。那就是按“修正优待条件”所示，甘心放弃帝王尊号，打消复辟欲望，做一个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中国第一富有的“平民”。如求上进，可以用充足的财力求学深造，增长才干，对社会进步有所作为；

一条，继续与时代潮流对抗，为复旧做垂死挣扎：谋恢复“优待条件”，争取重返紫禁城，进而谋帝制复辟，那就要寻求支持，为人利用。

溥仪的心里不无矛盾。在他的思想境界里，有青年人向往自由，追求上进，弃旧图新的角落，但仍顽固地保留着一个“恢复祖业”的王国。正如溥仪所说：“在我的思想中，以为祖国是一家一姓帝王的祖国，认为清朝是中国的正统。辛亥革命让政时我岁数还小，那是受了袁世凯的愚弄。恢复祖先的事业是我第一个任务。”^①

对于被逐出宫，并不像他对鹿钟麟表示的那么开明、理

^① 《溥仪笔供》(1954年6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九·一八事变》，第365页，中华书局，1988年。



解，而是视为冯玉祥不近人情。他将自己比做“困龙”、“蒙尘”，说什么“我当皇上，也是天注定的，是前生修来的福。我现在是困龙受灾难，等灾难一过，我还回甘当真龙天子。”^①然而，复辟没有市场，从辛亥革命起，中国人民坚决不要皇帝；谁实行帝制，谁就被抛弃，被打倒。

而这时溥仪身边的人，包围着他。企图影响他、支配他的人，除了王公贵族遗老们之外，又增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后者看准了目标，不遗余力的争夺，终于一步一步地把溥仪引入自己设计的圈套。溥仪从一个牢笼出来又钻进一个更黑暗的牢笼，解脱一种控制，又被加上更严酷的控制，生来就不幸的溥仪，进一步陷入更大的不幸和罪恶深渊。

232

第一节 从北府逃到东交民巷曰使馆

溥仪住在北府，门外国民军看管着，他不得自由出入。

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月八日，鹿钟麟和张璧又到北府，因为他们听说溥仪要出走，以谈善后的名义，前往开导。

载沣出面接待。鹿钟麟提出三件事：第一，北府守卫情况；第二，故宫雇用人员尚不下千人，先遣散一部，然后逐步收缩^②；第三，国务院决定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办理善后事宜，特来征询溥仪意见。载沣很开通，表示宫中一切听善后委员会主持办理，不必征询溥仪意见，他已是一个新人物，出

^① 傅璇：《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34页。

^② 内太监480余人，宫女百余人。



宫是一件幸事。

鹿钟麟要求与溥仪一见。他俩又有一段交谈。鹿钟麟回忆说：

“我向溥仪说明来意后，问道：‘你对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还有什么意见？’溥仪答：‘民国政府对清室仍然如此优待，我实在再没有什么意见了。’我继又问：‘你对废除皇帝尊号有何感想？’溥仪答说：‘废除皇帝尊号，我不但完全接受，而且也感觉很轻松，因为我对宫廷生活，早已厌腻，今天能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平民，实在是一件幸事。’我接着问：‘你考虑过将来如何打算吗？’溥仪答：‘关于我个人的将来，现在还没有具体打算，只希望在北京能有个住处，多读些书，如有可能，也有个出国深造的愿望。’^①

载沣和溥仪都要求门禁放宽，出入给予方便。鹿钟麟答应了，规定醇王府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前来会见的人，只要溥仪同意，即准出入；但年轻人、外国人不得自由出入。

溥仪内心隐藏着另一种念头，只有鹿钟麟走后，才对婉容、文绣说出来。他认为“宫中的东西，全是列祖先帝苦心经营起来的，积二百多年的财力，始有今天，应当是我们皇室私财。现在全叫冯玉祥给强霸占去了，天理何容？”^②

宫中的财物，确实把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公物进行处理，其中主要是文物。确认属于私有者都归还了他和他的家庭成员。早在十一月十一日，绍英要求发还宫中所存银两，经国务院批准发还。共有库存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二两，多

① 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始末》，《文史集萃》，第5辑，第72页。

② 傅嫡：《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27页。



数是元宝、大小银锭，少数为金银钱，有的上面镌有福、禄、寿、喜、财等字样，因有文物价值，善后委员会留出大元宝十三锭、寿字中锭二枚，金银小锞子二枚、金银钱各一枚，用于陈列展出，其余均归还溥仪。至于衣物、生活用品等，均允取出。十一月二十日，敬懿、荣惠两太妃出宫时，她们宫中所存银两二万五千三百两及衣服、用品、家具等，全准带走。清点工作结束后，将属于私人的财产概行归还。

不可忽视的是，“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中规定，政府每年补助清室五十万元，并特支二百万元在北京开办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这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收入。

此外，溥仪在京城和外地，还有存款、土地、房产等。但到底有什么、有多少，他这个一家之主说不清楚。鹿钟麟问到他皇室财产情况时，他回答说：皇室私产，一向由内务府管，“我不清楚”。绍英现在也在那里，可以叫他把皇室私产全部交出来。绍英是总管内务府大臣，也就是皇帝的大管家，他也说不清楚皇室有多少财产，对张璧说：内务府所管的皇室私产，除在盐业银行所存的现款可以很快地交出外，还有房产、土地很多，这些年来我们就没清查过。现在有极少数按季交租银的还可以查得出来，不交租的我们连房产、土地等有多少，坐落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谈起房地的契约、合同。绍英说：“契约、合同有的是，现在库里存放。如要清查的话，就是每天用筐子来抬也得抬上几天。”^① 这大概是中国头号大富翁，也是第一大糊涂。溥仪也没考虑如何用他的财富从事有意义的事业。

自从溥仪到北府，他周围的人们对冯玉祥没有底，不知

^① 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第9~10页。



将发生什么情况，气氛非常紧张。溥仪的父亲载沣失魂落魄，语无伦次，半点主意也没有。据庄士敦说，溥仪倒很庄严平静。

庄士敦搬出了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他们向摄政内阁的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抗议”，王正廷保证溥仪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这个消息，府中气氛和缓了下来。

到北府后，王公和遗老旧臣们开始商讨“营救”溥仪的方案。随着形势变化，“营救”的方式、内容也不断更新。大体以载沣为首的清室王公贵族们，反对溥仪离开北府；幻想争回“优待条件”，重返紫禁城，享受昔日优待。以郑孝胥、罗振玉、庄士敦等为一派，再加上一个胡适，主张溥仪出洋深造，借助外力图恢复。

前者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到政界、军界求援，尤其是着眼于北京政变后将对北京政权起主宰作用的奉系、段祺瑞、内阁总理黄郛等。当然得到的答复多半不坏。而且很快奉军入京，段祺瑞出山，冯玉祥受排挤，黄郛内阁结束。这一派的幻想有增无减。特别是段祺瑞，有许诺在先，有行动在后，如果不是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孙中山北上并明确表态，段祺瑞不会收敛，王爷们还要以胜利者自居呢。

后者要复杂得多，表面上是营救，幕后的内容是溥仪想不到的。这中间的关键性人物是郑孝胥和罗振玉。

郑孝胥（1860～1938），福建人，举人，曾在日本东京任驻日本使馆书记官、日筑领事、神户大阪总领事等职^①，光绪二十年（1894）归国。后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广西边防

^① 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第19页。



督办、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凡诗文简札题识，仍用宣统甲子，始终疾恶共和，来尝书民国年号也。”北京政府授官不受^①。民国十二年（1923）农历七月奉溥仪召入京，“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溥仪“大为倾倒”，“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②先任懋勤殿行走，民国十三年（1924）三月三日，溥仪命之为总理内务府大臣，佩带内务府大臣印钥，赏头品顶戴，全权整顿内务府，六月二十五日辞职，仍任懋勤殿行走，进讲资治通鉴^③。

罗振玉（1866～1940），江苏人，十五岁中秀才，后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三年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爆发，亡命日本京都，“虽闭门著书，不问世事，而实际则异常积极，联络友邦朝野，待时而起。”^④升允、善耆到日本寻求复辟支援时，和罗联系^⑤。在日本住九年，民国八年（1919）春回国。离日本前与犬养毅谈政治，强调东西方之不同，东方政教之一致，应及早防赤等^⑥。“从日本归国，住在天津租界，因为和日本人的关系较深，和日本驻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司令部的首脑都有往来”^⑦。民国十三年（1924）农历八月，溥仪诏入直南书房，命审定内府所藏古彝器，查养心

① 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第5页。

②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68页。

③ 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第32页。

④ 陈邦直著：《罗振玉传》，第33页。

⑤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00页。

⑥ 陈邦直著：《罗振玉传》，第43页。

⑦ 罗继祖：《庭闻忆略》，第109页，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5年。



殿陈设物品^①。

这两个人一步一步把溥仪送到日本侵华势力手中去。据溥仪说，民国十二年九月，日本发生大震灾，溥仪拿出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赈灾，日本芳泽谦吉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人宫向溥仪致谢，从此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就和紫禁城的某些人有了交际。罗、郑到紫禁城后，竟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②。溥仪被驱逐出宫到北府之后，郑、罗，日本使馆，北京政变后出任执政的段祺瑞，三者之间围绕着溥仪的安排问题，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密谋，居间沟通者郑、罗二人。日本方面和郑、罗二人，对于“营救”溥仪出北府，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他们并不是出于关心和担心，因为段祺瑞掌政后的北京政府，实在没有，也不能对溥仪采取什么比“修正优待条件”更可怕的步骤。只因为溥仪是大清皇帝，“奇货可居”，在日本侵华阴谋中也许用得上，谁把他掌握到手，都是一笔不小的资本。段祺瑞和日本的关系有史可查，当然密切配合。此外，庄士敦是溥仪的老谋士，催促溥仪早日离开，和溥仪研究着出洋深造的事，他还转达了张作霖的“关怀”，张作霖欢迎溥仪到东北去住。金梁鼓动溥仪先出洋留学，“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虚名上之帝号必不可要，而人心中之帝号必不可不要”，亦即“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③。和郑孝胥交了朋友的胡适，先登报表示了对武力胁迫修改“优待条件”的义愤，然后上门劝溥仪下决心出洋。郑孝胥和金梁“几乎每天轮流到北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47页。

②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1页。

③ 金梁：《遇变日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99—102页。



府与溥仪进行密谈，有时也在一起吃饭。”^① 载沣进行监视，溥仪很反感，向父亲明确表示，有来访者不希望他总在场。

溥仪本来就对王公大臣的禁锢、封锁不满，反抗过。出宫以后根本不打算在北府久留，拟购裱褙胡同一处房屋，从北府迁出。十一月二十六日，溥仪写给张作霖的信中说：“数年以来，困守宫中，囿于闻见”，乘此出宫后的机会，“拟为出洋之行”，需准备一段时间，“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② 在力主出洋派各种人物的推动下，溥仪下决心外逃。

关于出逃计划，最先是郑孝胥和日本使馆卫队司令官竹本多吉大佐商定的：由竹本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便衣，带一名医生，假装送溥仪去医院，出北府，进日本兵营。十一月五日夜，郑孝胥带着两个日本人到北府，说出计划，遭到王公大臣和师傅们一致反对，认为太冒险。载沣反对最激烈，他说即使进了东交民巷日使馆，冯玉祥向我要人怎么办？^③ 故“阻不得行。”^④ 郑孝胥和日本人被送走了。

接着是罗振玉经过奔走天津日本驻屯军、段祺瑞诸方，谋得的有攻有守的方案。还在冯军入城驻兵景山时，罗振玉即赴日本公使馆，谋得通行证，并与竹本大佐取得联系，约定有事以无线电报通知。十一月五日，乘车赴津，“行装甫卸，迳赴日本军司令部，见参谋金子氏”，金子告以顷接北京电报，鹿钟麟已率兵入宫，逼改清室优待条件。罗振玉请日司令官出名片介绍见段祺瑞^⑤。这时段祺瑞已接到竹本大佐转

^① 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盾》，第25页。

^② 郑孝胥日记，转引自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4页。

^③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2页。

^④ 金梁：《遇变日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95页。

^⑤ 陈邦直著：《罗振玉传》，第48、40页。



来的郑孝胥求援电报^①。罗到段邸，段已就寝，由秘书丁士源代见，段允发电阻止冯军，由罗、丁商定电文，交日本军司令部拍发。罗并请段再发一官报，段允。六日返京，知溥仪已出宫。次日到北府见溥仪。段祺瑞十一月六日（鱼日）已发出反对冯玉祥“逼宫”电报。在天津时日本军司令部的人告诉罗，北京的竹本大佐有办法。所以他返京后去找竹本，竹本说：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果国民军有异动，日本兵营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同时日本兵营转来段祺瑞“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护财产”的电报。

十一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二十八日，北府大门国民军受段祺瑞之命撤走，由几名警察站岗守卫。段祺瑞甚至有可考虑恢复“优待条件”的表示，形势已经缓和。如果仅仅为了溥仪的安全，为了索回皇室的利益，就会全力与政府交涉恢复政变前的待遇。奇怪的是，郑、罗等人制造新的紧张空气，因而有最后逃出北府进入日使馆的方案和行动。

十一月二十八日，郑孝胥拿着日本使馆支配下的日商报《顺天时报》，大惊小怪地指着上面一条关于“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的消息给溥仪看，上面有“留宣统，真怪异，唯一污点尚未去”之语。郑说天下要大乱，“赤化主义”要对溥仪下毒手了。罗振玉报告说日本人得到情报，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溥仪有不利行动，并且说一二天内可能出事，必须马上离开。庄士敦也带来外国报纸上关于冯玉祥要第三次对北京采取行动的消息。溥仪对外界隔膜，听了他们的话，惊慌失措。陈宝琛本来和郑孝胥的关系就很亲密，这时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2页。



也同意郑孝胥等人的意见，要溥仪赶快躲进东交民巷去。

溥仪与陈宝琛、庄士敦“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①。郑孝胥、陈宝琛到庄士敦处“共同磋商”^②。郑孝胥与陈宝琛、罗振玉“密筹脱出之计”^③。总之，溥仪及这些谋士们进行了一系列密谋，做出一个四步行动计划。第一步，溥仪和陈宝琛出去探望十一月二十日出宫住在麒麟碑胡同的敬懿、荣惠两太妃。之后，回北府，使府中人们对溥仪外出放心。第二步，借口去裱褙胡同看一所准备租用的房子，从那里去东交民巷，住进德国医院。第三步，住日本使馆。第四步，接着属到东交民巷。

这个计划既对官方保密，也瞒着王爷。但事先与日本使馆取得联系，得到了支持。郑孝胥说事先议定去日使馆。溥佳说：二十六日晚，郑孝胥带日本使馆武官和翻译到北府，与溥仪密谈，建议溥仪去东交民巷，他们一定帮助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④。

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记载：他与溥仪、陈宝琛商量好，由陈宝琛借庄士敦的汽车去北府迎溥仪，先到德国医院小憩，然后去日使馆。事先，罗振玉与日使芳泽打过招呼，芳泽的答复是使馆派人去接不方便，如自己来，当竭诚保卫。有了日本使馆的同意，溥仪开始实施行动计划。

第一步，很容易地做到了。

第二步，是关键。定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进行。行动的前两天，溥仪把从宫中带出的珠宝整理在一个手提箱里，准备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82页。

② [英]庄士敦著，陈时伟等译，马小军校：《紫禁城的黄昏》，第334页。

③ 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第6页。

④ 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第27页。



带走^①。二十九日这天，正午稍过，溥仪动身出门，先对溥佳说：“我现在就到东交民巷，住处还没找好，皇后和淑妃先不要去，等我找好了住处之后，再派人接她们来。你们以后再找我去罢。”^②为了不引起王爷怀疑，溥仪没带行李，只把一包珍宝交给庄士敦，放在庄士敦的皮大衣夹层里带走。但溥仪刚上汽车，载沣的大管家张文治奉王爷之命要求陪同前往，卖为监视。溥仪和庄士敦乘第一辆汽车，陈宝琛和张文治乘第二辆汽车。出门时，两名警察踏上溥仪坐的车两旁踏板上同行，是例行公事，没有监视任务。汽车在庄士敦指挥下开往使馆区。为了蒙骗张文治，先到乌利文洋行停一下，装做买东西，溥仪在这里买了一块法国金怀表，又到德国医院。那里的棣柏医生曾入宫看病，认识溥仪。到医院后，庄士敦向棣柏说明来意，溥仪就到一个空病房休息。张文治见状，立即回府报告。庄士敦去使馆交涉，他先后去日本、荷兰、英国使馆，最后在下午近三点钟见到日本公使芳泽，芳泽同意接纳溥仪，并准备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给溥仪用。庄士敦回到德国医院，但这时溥仪已被郑孝胥接走了^③。

原来郑孝胥去北府时是下午，溥仪已经出走。郑孝胥找到德国医院，见到了溥仪和陈宝琛。庄士敦还没回来。郑说已议定可去日本使馆。溥仪令郑去通报日使馆。郑去日使馆见到竹本，竹本报告公使芳泽，然后说：“请皇帝速来。^④郑回到医院引溥仪出医院后门，登马车驱日使馆。竹本先把溥仪迎入兵营。庄士敦从医院再返回日使馆，在竹本大佐的司

^① 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第28页。

^② 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第29页。

^③ [英]庄士敦著，陈时伟等译，马小军校：《紫禁城的黄昏》，第338页。

^④ 郑孝胥日记，转引自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83～184页。



令部见到溥仪、郑孝胥、陈宝琛等人。随后，芳泽把溥仪迎入使馆^①。张文治回府报告后，载沣等一行前来。

溥仪从他父亲家里逃到日本使馆，是福是祸？在罗振玉传和郑孝胥传里，都把这件事作为营救皇帝的历史功绩来写。溥仪本人急于逃出，当然认为是得救，一则冯玉祥再有什么行动，便无奈何于他；二则以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再也管不着他。他当庆幸自己获得了“自由”。但以后的命运并非如此。

溥仪逃到日本使馆后，命郑孝胥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告知张作霖^②。中国政府认可。芳泽将溥仪来日使馆事告知民国政府外交部并转段执政，“蒙其答复，极为谅解。”^③ 虽有“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发表宣言，谴责段政府放纵溥仪和日本，但政府默然置之^④。执政府除向芳泽表态外，又派陆军中将曲同丰，亲自到日本兵营竹本那里，表示执政府极愿尊重逊帝自由意志，并在可能范围内，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其关系者安全^⑤。

日本方面对这件事极为重视。芳泽收留了溥仪之后，发表公开谈话，说“事出突然”，佯做事先不知，欺骗视听。并立即发电报告知其本国；电话通知各国使馆及各公使夫人。芳泽亲自为溥仪打扫住处，命书记官池部政次侍候^⑥。溥仪到使馆的第二天，婉容要驱车出北府去使馆，被阻。她给溥仪

^① [英]庄士敦著，陈时伟等译，马小军校：《紫禁城的黄昏》，第339～340页。

^② 郑孝胥日记，转自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84页。

^③ 《顺天时报》，1924年11月30日。

^④ 吴锡祺：《记溥仪出宫》，《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117页。

^⑤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88页。

^⑥ 陈邦直著：《罗振玉传》，第52页。



写了一张便笺，祈求溥仪想办法把她接出去。芳泽得知，派外交秘书带着命令去北府接婉容，又被阻。于是，芳泽亲自去找段执政，要求段下令给北府卫队放行。“不到一小时，秘书先生顺利回到公使馆，带回了皇后。”^① 婉容和文绣到了溥仪身边。

溥仪和他的妻妾，加上太监、宫女、随侍、厨役、南书房行走、内务府大臣等，共几十人，使馆特意腾出一所楼房给他们住。于是宫廷的奏事处，值班房全部恢复。在这里，度过民国十四年春节。春节这天，溥仪坐在座北朝南的西式椅子（代宝座）上，接受了王公遗老旧臣的朝贺。溥仪生日那天，使馆把礼堂让出来，供祝寿之用，王公大臣、遗老、东交民巷各国的使馆人员，共五六百人，分班贺寿。溥仪借此机会发表演说，大肆攻击冯玉祥“不近人情”、民国“失信”，宣泄“心中抑郁”。日使对溥仪可谓关怀温暖备至。住在使馆，他的父亲及家族其他成员不断到使馆看望，规劝溥仪回府，溥仪不允。实际上他已经成为日本的笼中鸟，想回也回不去了。在日使馆，郑孝胥、罗振玉的态度发生突变，简直视溥仪为他们看管的囚徒。罗振玉对前来看望溥仪的王公遗老们，正言厉色地说：“这里不同在北府，每天来的人太多，对于使馆治安上很不相宜。我已和使馆方面谈妥，今后有事要来的，就在星期三，五两日；其他的日子要来，就必须经过使馆方面许可才能进来。”溥仪的情绪很不好，对溥佳说：“我来到日本使馆以后，感觉很不方便，就连院子走走都不随便。”“可是北府也不能再回去了，我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② 他并不知

^① [英]庄士敦著，陈时伟等译，马小军校，《紫禁城的黄昏》，第341页。

^② 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第30~31页。



道，去哪里也逃不出日本的手心。

第二节 天津公寓与东北军界

溥仪在日使馆住了近三个月，他决定去日本留学。这时郑孝胥、罗振玉因争夺“营救”溥仪之功，及争夺对溥仪控制权，斗得不可开交。郑孝胥居劣势而回上海。罗振玉出台唱主角，他和日本使馆书记官池部政次策划，并得到芳泽同意，决定把溥仪送到天津去。但他对溥仪说到天津好做出洋准备。溥仪同意了。冯玉祥军队入京后，溥仪曾和他的伴读兄弟溥杰、溥佳秘密商议，如果宫中不能住，即去天津，到早先准备的住处去。那所房子在英租界。

244

但罗振玉说最好住日租界；住英租界不合适。溥仪后来回答关于这个问题的询问时说：“住在日租界，人家‘保护’起来方便。”^①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月二十三日，溥仪向芳泽公使夫妇辞行、道谢，合影留念。然后由专程来京的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护送，罗氏父子（福葆）陪同，前往天津。在天津车站迎接溥仪的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官兵，约数十名。溥仪天津之行，对北京政府并不保密，芳泽通知了段执政和外交总长。段祺瑞不但同意，还要派军队护送，劳泽没接受。事后，日本公使馆又发表声明，还是说溥仪“突然”向天津出发^②，表示他们事先不曾与

① 潘际培著：《宣统皇帝秘闻》，第55页。

② 《顺天时报》，门25年2月25日。